

新中国 70 年财政支撑国家发展的逻辑

李成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42)

摘 要: 新中国 70 年, 财政支撑着国家发展蕴含在三条逻辑线索当中。一是不确定性与风险逻辑, 即财政致力于化解各种公共风险,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二是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 即强调以人为本, 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用于国家发展目标, 强调财政围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做文章。三是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 即按照行为主义的思路考虑财政发展和改革以及财政各项制度设计, 坚持在实践当中完善各项制度, 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避免国家发展出现重大风险。在新时代, 上述逻辑依然成立, 但又有新的内涵, 总体上要以推动整体性发展和改革为目标, 以应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为任务,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财政逻辑; 公共风险; 人民逻辑; 创新逻辑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60(2019)11-0048-08

DOI: 10.19337/j.cnki.34-1093/f.2019.11.005

一、引言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70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成为世界上的重要国家,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70 年来, 在支撑中国发展的过程中, 财政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立体交叉、相互交织, 形成了不确定性与风险逻辑、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不确定性与风险逻辑是从财政的基本职能和基础性作用来看财政逻辑。新中国 70 年来, 财政始终致力于化解各个时期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是从财政的价值取向和动力机制来看财政逻辑。强调以人为本, 着眼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对国家发展目标进行定位, 财政立足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做文章。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是从财政发展与改革的方法论来看财政逻辑。强调按照行为主义的思维方式考虑财政发展和改革以及财政各项制度设计, 坚持在实践当中完善各项制度, 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避免国家发展出现重大风险。

上述三个方面的逻辑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其中不确定性与风险逻辑是主线, 是财政支撑国家发展的基础逻辑, 70 年财政的发展、改革和变迁都是围绕化解各个时期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来展开。另外两个方面与不确定性及风险逻辑是一体的, 是不确定性与风险逻辑的不同侧面和具体化。首先, 不确

收稿日期: 2019-09-29

作者简介: 李成威(1977—), 男, 江西庐山人, 博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税体制研究”(17VZL011)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项目“新中国财政 70 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感谢刘尚希研究员、傅志华研究员等对本文提出的建议。

定性风险逻辑和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是一体的。财政要化解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和人民逻辑“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才不会从目标上走偏;同时,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其次,不确定性风险逻辑和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也是一体的。财政要化解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必须按照行为主义的思路来考虑财政发展和改革的路径,基于公共风险的变化来不断调整发展和改革策略,而不是守住固定的模式不变,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发展出现重大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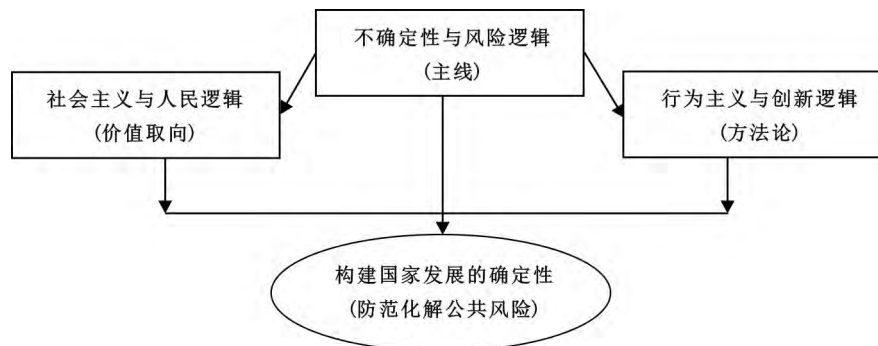


图1 财政支撑国家发展的三条逻辑及其关系图解

如图1所示,上述三个逻辑共同构成了新中国70年财政支撑国家发展的逻辑,并贯穿于各个时期。三条逻辑的表现形式只是在各个时期有所差别,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二、主线:不确定性风险逻辑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70年来,新中国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经历了曲折。客观地说,国家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是从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70年来,基于各个时期面临的问题,财政不断化解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公共风险,使得各项事业不断推进,同时也推动着制度不断完善和创新。

(一) 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变迁:从落后到不平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矛盾是“百废待兴”,经济社会一穷二白,落后是当时国家发展面临的最大公共风险。落后主要体现在工业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当中90%左右为农业,工业占比仅为10%左右。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了工业化发展目标,希望改变国家落后的局面。1949—1952年,中国就在为实现工业化准备条件。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³⁵⁶

到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和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挫折和制约,当时的主要公共风险依然是落后。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人均GDP只有224.9美元;农村贫困程度高,按目前的2300元扶贫标准计算,农村贫困人口占比将超过95%(周天勇,2008)。粮食总产量虽然在1978年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也只是略高于1957年(李先念,1992)³⁸⁹。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甚至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要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在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90.03万亿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13.2万亿美元左右,继续处在全球第二的位置上;2018年,中国人均GDP9462美元,而印度人均GDP仅1978美元,中国是印度的4.78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仅为1.7%。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公共风险。例如,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拉大的趋

势,个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及收入与财富差距明显。这说明,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面临的公共风险从主要是落后已经演化成主要是不平衡。因此,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至关重要,也事关全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二) 财政在化解公共风险过程中不断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

基于不确定性和风险逻辑,可以看清财政的基本职能,即通过占有、使用、分配一定的社会资源,防范和化解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财政占有社会资源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就涉及到集中和分散的问题,涉及财政防范化解公共风险职能的实现形式问题。新中国70年,财政在收与放的过程中,不断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突出的公共风险是落后,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就必须集中社会资源搞基本建设。财政首先是要统一,通过集中资源推动工业化迅速发展。当然,当时受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财政走向了高度集中,以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然而过度集中的财政在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统得过多、统得过死,使得经济和社会主体积极性不能有效发挥出来。这又引发了另一种公共风险,即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依然得不到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不到有效提高,继续实行计划经济难以为继,国家发展面临重大挫折。在这种背景下,就要通过财政逐步放权和分权,激活市场和社会主体活力,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公有制到现在还依然存在。过去认为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加公有制,现在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取代,而公有制也不是一家独大,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国家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在理论上就可以迎刃而解。

进入新时代,财政着重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不平衡问题,从不平衡治理的角度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一方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相关群体的财政政策倾斜力度,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财政支撑;另一方面,涉及到收和放的问题,即事权的收和放。国家出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将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的义务教育、学生资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通过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政府间职责,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公共服务的角度解决区域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在支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财政的逻辑体现在集中和分散之中,也即建立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基础之上的财政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7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经历多次“放权—收权”的周期循环,这也体现在财政改革上,收收放放,一边收一边放,一直到现在没有完全定型。

历史的变迁具有不确定性,财政的逻辑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建构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财政事关整体和全局性,在国家发展面临风险的时候,不断防范和化解其所面临的各种公共风险,是财政发展和改革的重要目标。但也要意识到,财政在建构发展的确定性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规避风险的方法论,即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方法论遵循行为主义和创新逻辑。唯有如此,财政在建构发展的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中,才能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能避免激进做法带来灾难性后果。

三、价值取向: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

社会主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至上,就是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和人民逻辑,也是由不确定性逻辑和风险逻辑所决定的,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下,只有选择社会主义和人民逻辑,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构建巨大的确定性。

(一) 社会主义:人民成为普照之光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遵循特定的逻辑。从发展遵循的主导逻辑来看,发展以人民逻辑为主导,是社会

主义国家;发展以资本逻辑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但以哪个逻辑为主导,决定了其国家制度的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要看何为普照之光。如果人民成为普照之光,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资本成为普照之光,就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是主导,人民逻辑处于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逻辑为主导,但也要适当利用资本逻辑。强调人民立场,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涉及到一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涉及社会的公平正义,涉及人民群众能不能共享发展成果。从根本上讲,也涉及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资本至上。当资本统治了全社会和整个国家,资本成了最高的准则,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停滞下来。社会主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至上,就是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度借鉴苏联模式。但后来,意识到不能照搬照抄,苏联式道路走不通。建设社会主义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1996)²¹³。外国经验指的就是苏联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1977)²⁶⁷这个时候,“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提上日程。改革开放之后,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得更加紧密。

(二) 以人为本的财政体现的是人民逻辑

从财政发展的变迁来看,中国,经历了建设财政的逻辑——转向公共财政的逻辑——转向民生为本、以人为本的逻辑,之所以发生这些转型变化,直观来看属于大的体制转型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实际上都是特定公共风险背景下人民逻辑的体现,都是着眼于防范和化解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各个时期面临的各种公共风险。从“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再到“现代财政”,这是财政不断改革、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公共财政是物本财政,现代财政则是人本财政。如图2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财政是典型的“建设财政”,经济建设在财政支出安排中占很大比重,主要是解决短缺问题。90年代之后,才逐步走向“公共财政”,财政政策目标及其支出安排都是指向市场不能解决的各类公共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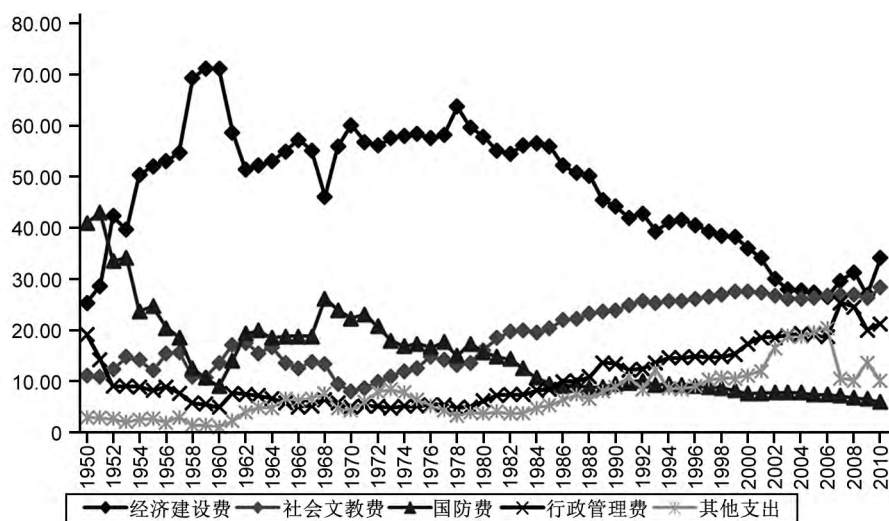


图2 1950—2010年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相关年度数据。

注:国家预算科目2007年发生变化,图中可比口径统计到2010年。

中国十八大以后,提出构建“现代财政”。“现代财政”的任务就是实现基本消费的平等化。从重要性程度来说,消费的平等最重要。消费的平等性问题,也就是所称的民生问题,其使命是实现基本消费的平等化。财政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手段,其承担的使命和改革的方向或目标也随之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财政上的体现,就是以人为本的财政,强调发展依靠人民。这就是作者过去提出的“民生财政”。民生并非一个福利的概念,民生财政的核心是强调从物转到人,意味着财政的大转型,财政要立足于促进人的自身的发展(刘尚希,2018)³³⁷。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身的发展。人的自身的发展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文化素质越来越高、劳动技能越来越强、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准各方面都越来越高。以人为本的财政,围绕这些方面做文章,也就体现了发展是为了人、发展是依靠人的思想。所以,以人为本的财政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致的。

从财政的角度看,体现在财政支出结构上,用于资本性、经济性的支出就越来越少,而用于社会性的支出,即用于“人”的支出或民生的支出越来越多。在现实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与人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支出越来越多,具体来说就是社会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政府要提供更多的福利,而是要有更多公共消费。因为公共消费最终都体现为提升人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学里有个“人力资本”概念,这个概念当中就蕴含了人民的重要性。如果说大多数人贫穷,大多数人没有“人力”,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发展得很好。只有国民素质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创造和创新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科技才能领先。图3显示,2017年的财政支出中,最高的一项为“教育支出”,占比超过14%。“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三项支出占比的合计约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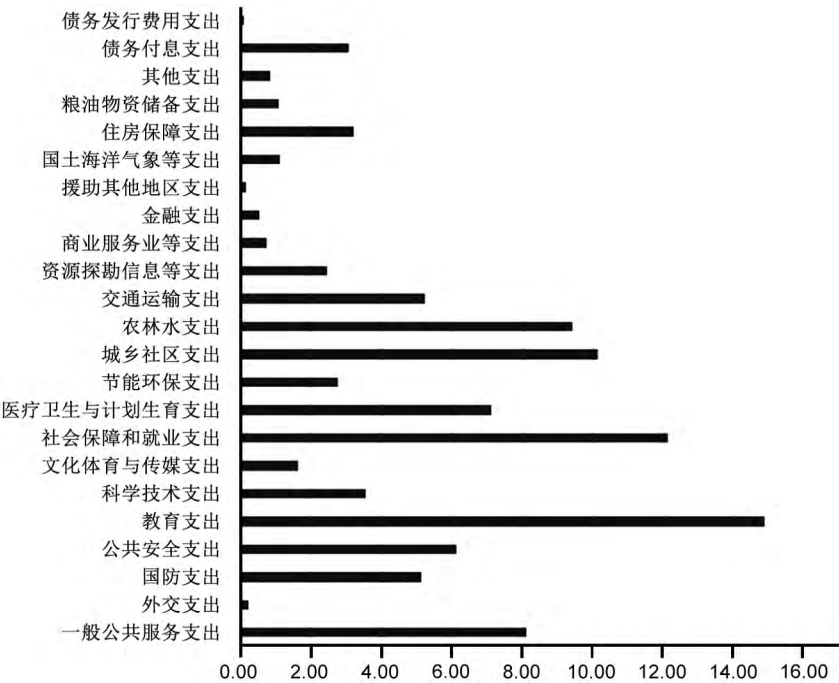


图3 2017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18》。

从图4看,三项支出呈逐年增长趋势。这些都是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体现的是当前背景下财政支出的人民逻辑,致力于通过提升和平衡人的能力,既为国家发展积累人力资本,又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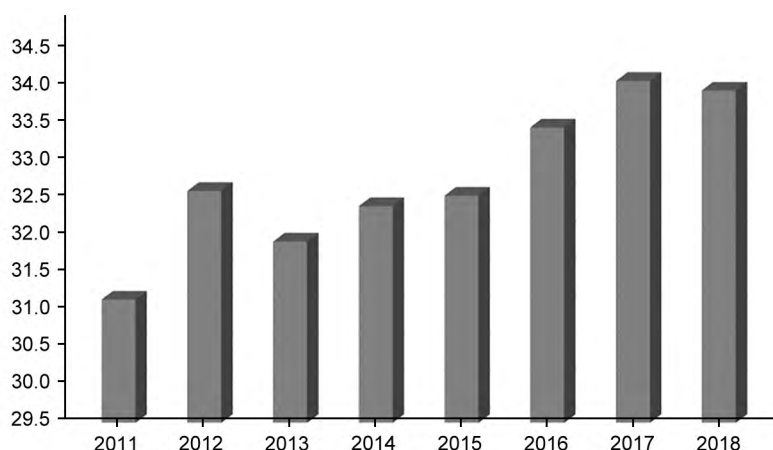


图4 “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三项支出占比合计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19》。

四、方法论: 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

毛泽东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1991)⁶⁶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1991)²⁸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无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唯有通过实践来实现,这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摸着石头过河”体现的就是行为主义的发展和改革模式。

(一) 行为主义发展和改革模式将国家发展风险降到最低

行为主义与文本主义的差别在于,任何行为都是外与内的综合,而文本主义只讲外,没有讲内。靠外在的力量,即一切靠制度去规范和约束,实际上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李成威,2018)。世界是不确定性的,如果制度是僵化的,这种制度是无法应对国家发展各种不确定性的,国家发展的问题不但不能解决,还会产生新的公共风险。这就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既强调法治又强调德治的原因,强调从行为出发出台措施,并通过制度来强化和规范,并根据公共风险变化灵活调整制度。新中国70年以来,国家发展坚持行为主义,并不说明没有制度设计,只是这种制度设计更加务实、更加符合现实要求,即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各种公共风险因素,并能根据公共风险的变化及时调整,灵活把握,而不是机械地套用制度。这种基于行为主义的制度设计能将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公共风险因素纳入制度设计中,减少不确定性和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刘尚希等,2017)。

(二) 行为主义与中国特色财政发展和改革道路创新

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体现在实践加创新与学习加创新的财政发展与改革方法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财政发展和改革创新在多个方面体现了行为主义特色。

首先,从总体上看,各个时期的财政制度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要求是密切相关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一个“统”字,因此财政也是高度统一的,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角度看,财政制度都是带有浓厚的“统”的色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激发地方、企业和个人的活力,财政从各个方面强调放权和分权。但在放权和分权的过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集中度,确保国家能系统地化解各个方面面临的公共风险。“统中有分,分中有统”这就是行为主义的典型特征。其次,从操作层面来看,财政发展和改革坚持“先试点、后改革”稳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避免由于激进式的改革措施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为国家发展留下后患。再次,中国的财政发展和改革在强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特别重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同时依据国情的变化及时采取变化性措施,而不是死抱教条主义不放。例如中国的收费制度变化就是如此,从最早鼓励各个部门收费、弥补财政不足,到后来不断整治和取消各种收费,强调国家财政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强化财经

纪律。最后,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在财政上体现最为充分的财政体制上的“制度上的集权、行为上的分权”。即在体制上,强调中国在国家制度上实行中央统一集权,但在实际运行上地方在很多方面有自主权,确保中央的政令畅通,地方又有发展的积极性。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与这种财政体制制度设计是密切相关的。

五、在新时代,财政支撑国家发展的逻辑有新内涵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同时,人类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站在70年新的历史起点上,不确定性与风险逻辑、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依然是新时代财政支撑国家发展的重要逻辑,但在新时代又有新的内涵,总体上要以推动整体性改革和发展为目标,以应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为任务,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 强调财政支撑国家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实现治理改革创新

在新时代,发展和改革都具有整体性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与中国现行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离开发展谈抽象的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没有任何意义。过去的发展和改革,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发展和改革,主要解决经济问题,解决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中国的财政发展和改革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展开的。未来的发展和改革,不仅仅是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解决治理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无法解决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风险,而必须靠整体性发展和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发展由过去的经济发展变成了整体性发展,改革也由过去的经济改革变成了全面改革。过去的经济改革是市场改革,现在的全面改革是治理改革。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财政基础,体现在发展和改革的整体性当中。财政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突出全面性,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顾此失彼。

(二) 强调完善财政法治体系,以权力重塑强化人民逻辑

人民逻辑和以人为本理念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需要好的财政分配规则,促进社会共建共享,需要财政法治体系,约束公共权力运行。财政法治化是约束公共权力的内在要求。约束公共权力,避免公共风险,需要实行财政法定。只有通过财政法定,将预算、税收等上升到法律形式,才能增强财政的约束力。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就是财政法定不足的一个体现,这对财经运行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财政法定,包括预算法定、税收法定、财政体制法定等,对于约束公共权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财政法治建设,需要权力的重塑。权力重塑具有多层次性。奠定市场经济体制基础,要通过财政法治建设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建立法治有效性的机制保障,要重塑财政权在人大、政府和司法之间的配置。在新形势下调动地方积极性,要重塑政府间财政关系。只有不断推动财政法治建设,使权责细化、明晰,配以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督体系,形成既分工制约、又合作共进的中国特色的财政法治。

(三) 强调财政的风险综合平衡功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在计划经济时代,理论界提出了国民经济“四大平衡”的观点,即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实现“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内部平衡和相互之间的综合平衡,其中财政平衡是关键。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实现公共风险综合平衡是关键。利益和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利益格局调整背后是风险配置的变化。利益实现包容表明风险配置最优,整体风险最低。因此,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必须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利益包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通过实现利益包容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

财政在调整利益格局和风险配置关系中发挥着耦合作用,如减少个人所得税,个人得到利益,个人承担的社会风险责任相应地减少,国家承担的风险增加。社会保险缴费费率和比例关系变化,表面上是

个人、企业、和国家利益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社会、企业、和国家承担风险责任的变化。通过财政的耦合作用,可以将多元主体力量的作用发挥最大,形成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治理结构。

财政要促进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合理共担风险。面对风险挑战,财政要贯彻好党的执政理念,推动建立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合理共担风险。要抑制个体风险的外部化,尽量实现风险的内部化。例如对微观金融风险和企业污染问题等,必须实行严格监管;要从债权债务关系着手,遏制经济风险传播。当前金融风险越来越成为经济风险中的重中之重。遏制公共风险从债权债务入手,降低宏观杠杆率,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些都是属于遏制经济领域公共风险的重要举措;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加快改革风险大锅饭体制。

参考文献:

- 李成威. 2018.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财政改革[J]. 西部论坛(5):6-13.
- 李先念. 199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 下卷.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89.
- 刘尚希. 2018. 公共风险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337.
- 刘尚希, 石英华, 王志刚. 2017. 公共债务管理新思维: 从制度约束转向行为约束[N]. 中国财经报, -07-04.
- 毛泽东. 1977. 论十大关系[M] // 毛泽东选集.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67.
- 毛泽东. 1991. 新民主主义论[M] // 毛泽东选集.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84-663.
- 毛泽东. 1996. 十年总结[M]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9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13.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6.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 北京: 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356.
- 周天勇. 2008. 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J]. 党建文汇(上半月版)(10):47.

Fiscal Cod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LI ChengWei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 Beijing 100142)

Abstract: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public finance has alway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ts fundamental effect can be found in three main logic lines. The first one revolves around uncertainty and risk , along which public finance is committed to resolving all kinds of public risks and building up the certaint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second one embraces socialism and the people. It emphasizes the people - oriented idea , which demands the go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centered on the basis of peopl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public finance on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people ,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people" principle. The third one is the behaviorism and innovation logic , which needs to consider fisc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design of fiscal syste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haviorism approach , persist in improving all systems ,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form ,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 and avoid major risks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 the above logic still holds true but with new connotations. On the whole , it's need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the goal targeting at promoting overal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task of handling the uncertainties of a risky society.

Keywords: fiscal logic; public risk; people logic; innovative logic

(责任编辑 刘志炜)